關上學術的大門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阿多米爾·雷·米蒂奇 （Radomir Ray Mitic） 在 2019 年夏季和秋季的部分時間裡研究了俄羅斯一所大學學生的公民意識和參與度。作為由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資助的研究的一部分，他採訪了學生、管理人員和教職員工，甚至住在宿舍裡，這樣他就可以進行第一手觀察。

但到 2022 年秋天，北達科他大學高等教育助理教授米蒂奇發表了一篇關於他的發現的論文時，這種實地考察已不再可行。將近一年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關上了獎學金的大門，切斷了國際學術合作夥伴關係，並使該國實際上成為美國和其他西方研究人員的禁區。

「這是一個警示故事，」米蒂奇說。「我看不到這類型的研究線繼續下去的可能。」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造成了突然的合作破裂。聯合項目一夜之間被取消，歐洲國家徹底禁止與俄羅斯的研究合作。俄羅斯政府也宣布了阻止國際合作的措施。

對於外部研究人員而言，俄羅斯並不是唯一一個實地考察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能的地方。在中國，習近平主席對權力的收緊已經延伸到學術界。檔案館已不對公眾開放。貿易政策或移民等曾經無關緊要的調查話題已經變得政治化。對於西方的謹慎態度使研究人員更難採訪官員或普通公民。中美關係緊張，包括美國政府制定的政策，進一步冷卻了學術交流。

如果說對研究俄國的學者來說大門已經關上了，那麼對研究中國的人來說，大門也在一點一點地關上。在經歷了近幾十年的相對開放之後，許多人擔心這可能會回到兩國基本封閉、學術界被迫在遠方開展工作的時代。

「我們又回到了冷戰時期的學者時代，」哈佛商學院副教授傑里米·弗里德曼 （Jeremy S. Friedman） 說，他研究俄羅斯、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歷史。

當然，科技使與全球同事的合作比過去容易得多，而 Covid-19 成功地對遠端合作進行了測試。有些人甚至看到了一線希望：如果在

中國和俄羅斯的研究受到限制，它可能會迫使學者尋找替代資源，突出新的觀點並推動學術研究朝著新的和可能有前途的方向發展。

但是，雖然有些工作可以遠距離完成，但對於其他領域，如檔案或輿論研究，沒有什麼可以替代實地考察。如果沒有實地考察，對某些問題或主題的研究可能會減少或完全枯竭。

即使使用電子郵件和視訊會議，學術合作也植根於人際關係。在一個地方花時間可以與未來的研究對象和可能的合作者建立信任。對於沒有時間建立專業網絡的研究生和處於職業生涯早期的學者來說，這種影響可能尤其嚴重。如果很難或不可能去俄羅斯或中國，新一代可能會不想研究它們。學術冷戰也可能會孤立這些國家的學者。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研究中國和俄羅斯的學者們並沒有忘記：了解這兩個地方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但正如他們的專業知識更受重視一樣，獲得第一手洞察力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

「當政治變得緊張時，人們經常忽略的一點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在這些時候更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喬治城大學中國歷史教授詹姆斯·米華德 （James A. Millward） 說。「如果門是關著的，我們就聽不到發生了什麼。」

過去三年裡，很少有外國研究人員前往中國，不是因為政治阻礙，而是疫情。該國嚴格的邊境限制使大多數學術和其他方面的遊客無法進入；中國政府上個月才取消了對國際旅客的長期檢疫要求。

儘管如此，在 Covid 之前，給外部研究人員的環境變得不那麼友好了。2018 年對駐紮在國外的 500 名關注中國的社會科學家進行的一項調查向學者詢問了他們在中國遇到的「壓制性研究經歷」，發現其中四分之一的人被拒絕資料閱覽。5% 的人表示很難獲得簽證，9% 的人表示他們被「邀請喝茶」，也就是說，他們受到了警察或其他地方當局的訊問。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對研究重點是臺灣或民主運動等政治敏感問題的外國學者施加限制。例如，米爾沃德此前曾因其在新疆的工作而被拒簽前往中國，而中國政府試圖在新疆鎮壓其維吾爾族穆斯林少數民族。

但中國學者表示，近年來紅線發生了變化，現在越來越多的主題

可能觸及政治敏感性。與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公共事務副教授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 一起進行 2018 年調查的羅里·特魯克斯（Rory Truex） 親眼目睹了這些變化。Truex 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助理教授，2004 年作為一名 19 歲的普林斯頓大學本科生首次前往中國參加沉浸式課程。他在暑假回來教英語和學習中文，並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實地研究他的博士論文和第一本關於中國立法制度的書。他說，這樣的研究「如今可能無法複製」。

Truex 說，過去研究人員可以「跑來跑去和每個人交談。我現在意識到那是一個相對的黃金時代。」

大部分緊縮政策與自 2013 年以來一直擔任中國領導人的習近平的崛起同時發生。習近平最近獲得前所未有的第三個任期，一直試圖在中國社會集中權力並壓制異議。但他也特別提到了高等教育，要求開設新課程，禁止在課堂上討論某些有爭議的話題，並任命政治盟友擔任大學領導人。在疫情期間，政府官員制定了新規定，要求中國教授在國際會議（甚至是線上會議）上發表學術論文之前必須獲得許可。

對於外國學者來說，對檔案研究的限制一直是學術界最明顯的限制之一。哈佛商學院的弗里德曼說，由於無法直接訪問，他們不得不依賴中文出版的摘錄，這些摘錄通常經過大量編輯。一些中國個別學者曾保留史料的「影子圖書館」，但這樣做的風險越來越大，一些人甚至面臨軟禁。

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擔心他們可能會捲入與他們的學術研究沒有直接關係的事件中。2018 年，中國政府以間諜罪拘留和審判兩名加拿大人，一名商人和一名在智庫工作的前外交官，此舉被視為對加拿大和美國當局以欺詐指控逮捕一名中國女商人的報復。雖然這些人不是學者，但他們三年的監禁讓研究人員感到害怕，他們擔心他們可能會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方。

事件發生後，亞洲協會出版的線上雜誌《中國檔案》對撰稿人進行了調查，詢問他們是否會在 Covid 限制解除後前往中國。40% 的受訪者——包括記者、民間社會工作者、前外交官和學者——表示他們可能或肯定不會。

「你不禁會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他身上，為什麼不是我呢？」哈佛商學院副教授梅格·里斯邁爾（Meg Rithmire）談到了逮捕行動。不過，有兩個年幼孩子的里思邁爾說，她覺得去中國旅行很安全，並希望 2023 年夏天能去中國。

事實上，外國學者的存在可能會給他們的中國同事帶來更多問題。Rithmire 是幾位如此表示的學者之一如果他們返回中國，他們很可能會在外國組織（例如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支持下這樣做，而不是讓中國教授或大學寫邀請函贊助他們的訪問。他們說，在當前環境下，接待一名美國研究人員可能會給當地學者帶來不必要的審查。

審查不是單方面的。在過去幾年中，美國政府也愈來愈對於和中國的學術合作持懷疑態度，認為大學校園容易受到中國挖走學術專長和知識產權的影響。川普政府調查並試圖起訴在中國工作的美國研究人員，稱其為學術間諜活動。儘管拜登政府結束了這項被稱為「中國倡議」的調查，但 2022 年政府機構和美國國會仍在繼續梳理研究人員與中國的關係。

新罕布什爾大學傳播與媒體研究助理教授張琳說，FBI 特務聯繫了一位從事中國生物技術產業研究的美國同事，她在研究旅行歸來後要求她分享她的聯繫方式以及她採訪過的每個人的名單。儘管這位同事拒絕了，但一些學者可能會退出在中國的工作，以免捲入地緣政治的交火之中。亞利桑那大學的研究人員在 2021 年對華裔和美籍華裔科學家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四分之一的人會節制與中國的聯繫，包括聯合研究項目、演講活動和訪問約會。

儘管唐納德·J·川普總統頒布的多項政策對來美國的中國學生和學者施加了限制，但他還取消了前往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傅爾布萊特項目。學者們表示，只有相對較少的學生和學者在美國政府的旗艦交流計劃中學習，但拜登總統並未撤銷該計劃，這表明美國政府非常重視獲得有關中國的專業知識。

事實上，從 2011 年巴拉克·歐巴馬總統大力推動將更多美國人送到中國到疫情開始期間，在中國學習的美國大學生人數下降了 20% 以上。如果花時間在實地學習中文或做研究變得更加困難，未來學者的儲備可能會進一步減少。

假設中國成為禁區，目前已有幫助年輕學者的措施。例如，一群中國學者為研究生和職業生涯早期學者組織了研討會，以制定從國外研究中國的策略。

在 Covid 來襲之前，新罕布什爾州張教授剛完成了她關於創業和中國數位經濟的第一本書的實地調查。在疫情期間，她試圖遠程繼續她的研究，但時差使這變得困難，而且「人們厭倦了 Zoom，」她說。

出生在中國的張教授計劃 2023 年夏天回國看望她的父母並進行一些研究。雖然她說她的主題不是特別敏感，但她預計在讓人們與她交談方面會遇到挑戰。在貿易戰中，政府官員甚至企業高層可能對來自美國的研究人員不太開放。

「作為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移民，我把自己看作一座橋樑，幫助雙方相互解釋彼此，」張說。「但當關係良好時，這個角色更容易發揮。」

作為一名年輕的學者，張不得不發表文章。因此，她做出了一個務實的決定：將她的研究重點從中國轉移到美國的移民知識工作者身上，尤其是在波士頓的生物醫學中心。她看到了這個群體與她之前研究對象的年輕中國企業家之間的共同點：他們都在海外接受教育，必須跨越兩種文化。

「我正在努力尋找能動性。我試圖在我的工作中找到價值，」張說。「感覺很自然。這是我做出的決定。」

雖然關注中國的學者正在試水溫，看看是否有可能重新涉足，但對於俄羅斯學者來說，這種決裂更加突然，也更加明確。

「這是一個重大的斷裂，」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教授、威斯康辛俄羅斯項目主任西奧多·P·格伯說。「看來短期內不會有圓滿的結局。」

在戰爭開始後的幾天內，長期合作夥伴關係已成為過去式。麻省理工學院與它幫助創辦的一所俄羅斯科技大學斷絕了聯繫；亞利桑那州董事會命令州立大學終止與俄羅斯大學的所有合作；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政治學教授朱麗葉·約翰遜（Juliet Johnson）是一個國際研究小組的成員，由於歐盟限制資金流向俄羅斯，該小組不得不撤掉一名駐莫斯科的研究人員。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在這個時候更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

儘管如此，約翰遜擔任主席的斯拉夫、東歐和歐亞研究協會發表聲明稱，它不會因為國籍而歧視個別研究人員。「這對我們來說非同尋常，因為我們通常不發表政治聲明，」她說。「但我們想表明機構和個人之間的區別。」

即便如此，在俄羅斯的實地考察已經停止。俄羅斯航班在歐洲和北美的領空被禁止飛行，美國政府也警告美國公民不要前往那裡。制裁使得幾乎不可能從西方國家向俄羅斯銀行使用信用卡或以電子方式轉帳。

研究中國和俄羅斯的哈佛商學院弗里德曼說，在戰前，俄羅斯的外國研究人員的氛圍在某些方面已經變得更加開放。與中國不同，俄羅斯近年來一直在開放其檔案並解密更多的歷史和政府檔案。「在疫情前夕，」弗里德曼說，「研究人員比過去 20 年來更容易接近俄羅斯。」

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外部學者仍有可能對俄羅斯檔案進行研究。雖然 Covid 限制使旅行變得困難，但檔案館仍然開放，學者們可以聘請當地研究生作為助手來尋找和複製文件。由於美國的制裁，該遠程研究選項不再有效。

然而，在其他方面，國際學術合作的空間在俄羅斯變得越來越受限。一項於 2021 年 4 月生效的高等教育法要求俄羅斯學者與外國同事之間的所有聯合研究項目都必須獲得俄羅斯政府的批准。兩個月後，與俄羅斯長期合作的巴德學院被俄羅斯檢察長辦公室列入黑名單，禁止在該國開展所有活動和業務。

那年夏天，當格伯採訪俄羅斯教授時，他們謹慎地談到了政府政策可能進一步限制他們與西方同行合作的擔憂。「學術界的所有人，至少是社會科學界的所有人，一直在預期 [美國/俄羅斯的緊張局勢] 會在某個時候打擊學術界以及俄羅斯大學、學者和西方同行之間的關係，」一位人士告訴格伯。

格伯說，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將俄羅斯學者，尤其是那些與西方有聯繫的學者視為潛在的政治對手。

在他與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研究員 Margarita Zavadskaya 合著的一篇論文中，格伯認為這場戰爭可能是俄羅斯獨立社會科學的終結，

而這實際上是在蘇聯解體後才出現的。冷戰期間，蘇聯政府投資於科學，但那裡的大學基本上不存在政治學等學科。與外國學者的合作以及政府資助幫助推動了這些領域的發展，並將俄羅斯學術的品質提高到國際水準。

格伯說，外國研究合作夥伴關係的消失，以及教授和科學家的外流，可能會損害俄羅斯的高等教育。「很多俄羅斯學者將是流亡學者。」

甚至在俄羅斯進攻烏克蘭之前，一些俄羅斯學者已經開始將他們的工作重心從俄羅斯轉移開來，這是出於對學術自由的限制和普丁領導下的其他政府政策。例如約翰遜決定將她的研究轉向金融民族主義和後蘇聯紀念碑，以在 2014 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之後，進行更廣泛的地區性焦點關注。

約翰遜承認，她的學術性質使轉換研究重點成為可能，但對其他人來說可能並不那麼順利。約翰遜的一名研究生不得不徹底重新考慮他的博士項目，該項目以俄羅斯的焦點小組研究為基礎。但是涉及敏感政治問題討論的研究不能在 Zoom 上進行。

對於利用檔案來闡明政策決定的弗里德曼來說，可能有機會在俄羅斯境外進行研究，在前蘇聯衛星或莫斯科軌道下的其他國家挖掘文件。但是，儘管這些材料可以提供新的見解，尤其是關於政策制定如何影響這些前哨基地的見解，但它們往往是片面的。他說，對於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來說，他們可能無法闡明內部審議。「這就好像你被迫從埃爾帕索、密爾沃基或傑克遜維爾而不是華盛頓特區講述美國的歷史一樣。」

今天，隨著學術專家試圖理解普丁試圖重申俄羅斯實力的行為和動機，失去實地訪問權的感覺可能會很強烈。「我們將回歸克里姆林學（Kremlinology），」約翰遜說。

中國問題學者裡思邁爾 （Rithmire） 指出，面對面的研究讓學者們接觸到不同的聲音，挑戰他們的假設，並經常使他們的工作走上意想不到的道路。沒有它，「你會失去細節，」她說。

和約翰遜一樣，研究移民問題的格伯也將他的研究重點從俄羅斯轉移了出去。儘管這項工作卓有成效，但由於後蘇聯時期投資的激增，其他國家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專業知識或研究基礎設施不及俄羅斯，因

此一些合作可能沒有那麼深入。

還有語言問題。和該地區的其他學者一樣，格伯會說俄語，但如今這可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烏克蘭和鄰國的人們已經接受了他們的母語，以此來表達他們對莫斯科的反對。格伯 正在考慮學習烏克蘭語。

一些學者將當前時刻視為一個機會，可以考慮在俄國影響少一點的情況下的俄羅斯研究會是什麼樣子。切爾涅茨基（Vitaly Chernetsky）是堪薩斯大學斯拉夫和歐亞語言與文學教授，在烏克蘭敖德薩長大，柏林牆倒塌時是美國的交換生。

三十多年後，父親仍留在烏克蘭的切爾涅茨基表示，該地區的學術研究仍然以俄羅斯為中心。俄羅斯作家、作曲家和詩人在西方經典中站穩腳跟，但來自他的祖國的作家、作曲家和詩人則不然。政治研究往往以莫斯科為中心並向外輻射。

切爾涅茨基和其他人表示，該領域需要進行他們所謂的「去殖民化」。「必須用一場戰爭來喚醒我們意識到結構變革的必要性，這太可怕了，」切爾涅茨基說，他是斯拉夫、東歐和歐亞研究協會的現任副主席。「我們需要轉變模式，認識到並非所有重要的事情都發生在聖彼得堡或莫斯科。」

切爾涅茨基說，烏克蘭尤其擁有良好的檔案，儘管由於戰爭，它們現在實際上已被禁止調閱。人們正在努力將其內容數據化並使其更廣泛地可用，而研究人員還可以與難民社區合作。

切爾涅茨基說，現在是自我反省的時候了。「我們如何從這一切中獲得更豐富的學問？」

這種反思可以擴展到如何教授該地區的課程。在一門關於後共產主義轉型的課程中，約翰遜用比較的視角分配了閱讀材料，而不是俄羅斯視角。

約翰遜的另一門關於俄羅斯政治的課程，本學期有 160 名學生——如果她沒有設定上限，入學率會更高。研究俄羅斯，並在俄羅斯這樣做，對下一代學者來說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但對它的渴望可能會越來越大。

對於約翰遜和其他人來說，俄羅斯和中國潛在的學術孤立對個人

和職業都有影響，使他們與同事和朋友的網絡隔絕。「我預計無法回去，」她說。「也許永遠不會。」

撰稿人/譯稿人：Karin Fischer/ Eileen Tsai

資料來源：2023 年 2 月 21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slamming-the-door-on-scholarship

國家教育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ER